

唐陈元通夫妇墓

靳维柏 郑东 主编
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编著



唐陈元通夫妇墓

靳维柏 郑 东 主编

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编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陈元通夫妇墓 / 靳维柏, 郑东主编; 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010-4602-7

I. ①唐… II. ①靳… ②郑… ③厦… III. ①合葬—墓葬 (考古)

—研究—厦门市—唐代 IV. ①K878.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9108号

唐陈元通夫妇墓

主 编: 靳维柏 郑 东

编 著: 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责任编辑: 冯冬梅

封面设计: 程星涛

责任印制: 梁秋卉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7.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4602-7

定 价: 198.00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序

厦门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历来同国内及国外不同谱系文化进行碰撞交流与融合。在五口通商之后成为海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文明，华侨资本的投入使厦门较早地享受到了现代工业的成果，地理位置又使厦门成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文化交融推动厦门的进步，也是历史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内陆地区的文明发展程度在时间上早于沿海地区，厦门岛的开发则迟至唐代中叶，此次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唐陈元通夫妇墓，对研究厦门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陈喜是陈元通的祖父，其家族是最早迁入和开发厦门岛的家族之一。陈元通生于唐建中二年（781年），曾任余干、南昌（今江西余干、南昌）县尉，后转为歙州（今安



2010年12月，张忠培先生（中）在北京住所与作者合影

徽歙县)司马参军,再后,迁任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令,唐大中九年(855年)卒于厦门岛家中。陈元通官阶虽低,却是当时少数厦门籍外出任官的人士之一。

唐陈元通夫妇墓的墓室形制规格较高,保存完整,反映了唐代建筑典型的风格和特点,出土的银鎏金摩羯纹多曲碗、银盏、银则、银笄、银篸、银冠饰等,图案精美,镌刻技艺高超,是唐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晶,随葬的长沙窑褐绿彩双系罐、邢窑白瓷碗与厦门窑青釉瓷器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汇,出土的墓志是厦门最早的铭刻。

《唐陈元通夫妇墓》的出版,是福建省唐代考古重要成果,是厦门的第一本考古发掘报告,为研究厦门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希望厦门的考古工作者继续努力,发现更多的考古遗存,做好文物保护和发表更多的考古报告。是以为序。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張忠培
2012年2月12日子小石橋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 言	1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1
一 地理环境	1
二 历史沿革	2
第二节 工作经历	3
一 发掘经过	3
二 工作人员	6
第二章 墓葬结构	7
第一节 墓 坑	7
第二节 墓室形制	9
第三节 棺 床	21
第四节 墓室内遗迹及器物分布	23
第三章 出土遗物	28
第一节 瓷 器	29
第二节 铜 器	37
第三节 铁 器	39
第四节 银 器	40
第五节 文字砖	52
第六节 其 他	52

第四章 墓志铭	64
第一节 墓志铭	64
第二节 墓志铭考释	69
第五章 结 语	72
第一节 综合研究的成果	72
一 陈元通夫妇墓出土的陶瓷器	72
二 陈元通夫妇墓出土的银器	75
第二节 考古发掘的意义及学术价值	77
一 考古发掘的意义	77
二 学术价值	78
附录一 福建唐代陈元通夫妇墓出土银质文物保护修复报告	81
附录二 福建唐代陈元通夫妇墓出土银质文物的微观结构分析	96
附录三 福建唐代陈元通夫妇墓出土铜棺钉制作工艺分析	106

插图目录

图一 陈元通夫妇墓地理位置图	4
图二 “唐上柱国陈公茔”墓碑	5
图三 “大唐赐进士出身陈公封茔”墓碑	5
图四 M1墓碑之下显露的封门墙顶部	7
图五 M1墓冢表土层中的蚁穴空洞	7
图六 M2盗洞口回填的乱砖	8
图七 M2盗洞回填土中的蚁穴空洞	8
图八 M2盗洞出土铜钱两枚	8
图九 M2盗洞回填土中出土白釉碗底瓷片	8
图一〇 M2墓室盗洞口填堵情形	9
图一一 M2墓室盗洞口（清理后）	9
图一二 M1墓室平、立、剖面图	10
图一三 M1墓室（从北向南）	11
图一四 M1墓室（封门墙未拆前）	11
图一五 M1墓室（封门墙拆除后）	11
图一六 M1墓室封门墙	12
图一七 M1墓室封门墙下半段横断面	12
图一八 M1墓室封门墙上半段背面	12
图一九 M1墓门	13
图二〇 M1墓室顶部表面砖缝	13
图二一 M1墓室侧面表面砖缝	13
图二二 M1墓室内部（从后向前）	14
图二三 M1墓室内部（清理后）	14
图二四 M1墓室西侧壁龛	14
图二五 M1墓室西壁上方小壁龛	15
图二六 M1墓尾壁龛外部	15

图二七	M1墓尾大壁龕	15
图二八	M2墓室平、立、剖面图	16
图二九	M2墓室（从东北向西南）	17
图三〇	M2墓室（从南向北）	17
图三一	M2墓室盗洞（从内向外）	17
图三二	M2墓室封门墙	18
图三三	M2封门墙中发现文字砖位置	19
图三四	M2墓门	19
图三五	M2墓室内部券顶	20
图三六	M2墓室东壁壁龕	20
图三七	M2东壁壁龕和上方小壁龕	20
图三八	M2墓尾壁龕外部	20
图三九	M2后壁大壁龕	21
图四〇	M1棺床	21
图四一	M1棺床侧面壶门纹长方砖	22
图四二	M1棺床腰坑形制	22
图四三	M1棺床平、立、剖面图	22
图四四	M2棺床平、立、剖面图	23
图四五	M2棺床（清理后）	23
图四六	M1墓室内部（清理发掘前）	24
图四七	M1棺木残片	24
图四八	M1棺床后部发现带朱漆的土块	24
图四九	M1中部腰坑出土铁皮碎片	25
图五〇	M1西壁墓志铭和上方小壁龕内的长明灯碗（清理发掘前）	25
图五一	M2墓室中后部（清理发掘前）	25
图五二	M2东壁小壁龕下弃置的长明灯碗（清理前）	26
图五三	M2盗洞下方丢弃的铜镜	26
图五四	M2墓室黑色地面和铜钱遗迹（清理后）	26
图五五	M2棺床腰坑内黑色灰烬	26
图五六	M2墓志铭出土时的墨色碑面（局部）	26
图五七	M1出土遗物分布图	28
图五八	M2出土遗物分布图	29
图五九	I式青釉双系小罐（M1：33）	30
图六〇	II式青釉双系小罐（M1：35）	30
图六一	III式青釉双系小罐（M1：34）	31

图六二	褐绿彩双系罐 (M1 : 36)	31
图六三	青釉盖罐 (M1 : 22、24)	32
图六四	青釉盖罐 (M1 : 30、31)	32
图六五	青釉盖罐 (M1 : 12、21)	33
图六六	青釉碗 (M1 : 37)	33
图六七	白釉碗 (M1 : 29)	33
图六八	青釉四系罐 (M2 : 14)	34
图六九	青釉四系罐 (M2 : 15)	35
图七〇	青釉四系罐 (M2 : 18)	35
图七一	青釉双系小罐 (M2 : 16)	36
图七二	青釉双系小罐 (M2 : 17)	36
图七三	青釉碗 (M2 : 5)	36
图七四	大谷仓罐 (M2 : 21)	37
图七五	铜镜 (M1 : 14)	38
图七六	小铜叉 (M1 : 16)	38
图七七	铜镜 (M2 : 1)	38
图七八	铜环 (M2 : 2)	39
图七九	铁剪 (M1 : 2)	40
图八〇	铁剪 (M2 : 20)	40
图八一	摩羯纹多曲银碗 (M1 : 23)	41
图八二	摩羯纹多曲银碗 (M1 : 23)	42
图八三	四瓣形银盏 (M1 : 27)	43
图八四	银则 (M1 : 28)	44
图八五	银箸 (M1 : 25)	45
图八六	I 式尖首银钗 (M1 : 5)	46
图八七	II 式双股形银钗 (M1 : 3)	47
图八八	弧首银钗 (M1 : 6)	47
图八九	I 式双股形银钗 (M1 : 8)	47
图九〇	II 式双股形银钗 (M1 : 9、M1 : 10)	48
图九一	I 式银冠饰片 (M1 : 11)	48
图九二	I 式银冠饰片 (M1 : 11)	49
图九三	II 式银冠饰片 (M1 : 11)	49
图九四	II 式银冠饰片 (M1 : 11)	49
图九五	III 式银冠饰片 (M1 : 11)	50
图九六	III 式银冠饰片 (M1 : 11)	50

图九七 小银锅 (M2 : 8、9)	51
图九八 银枝条 (M1 : 11)	52
图九九 M1文字砖	53
图一〇〇 M2文字砖	53
图一〇一 M1出土部分铜钱	54
图一〇二 M1“开元通宝”铜钱	54
图一〇三 M1“开元通宝”铜钱 (背面“润”字和月纹)	55
图一〇四 M1“乾元重宝”铜钱	55
图一〇五 I式铜泡 (M1 : 3)	56
图一〇六 II式铜泡 (M1 : 32)	56
图一〇七 I式铜泡钉 (M1)	56
图一〇八 II式铜泡钉 (M1)	57
图一〇九 I式棺钉 (M1)	57
图一一〇 II式棺钉 (M1)	57
图一一一 扇形砖 (M1)	58
图一一二 I式楔形砖 (M1)	58
图一一三 II式楔形砖 (M1)	59
图一一四 I式长方形砖 (M1)	59
图一一五 II式长方形砖 (M1)	59
图一一六 方形砖 (M1)	60
图一一七 壶门纹长方砖 (M1)	60
图一一八 M2出土部分铜钱	61
图一一九 M2“开元通宝”铜钱	61
图一二〇 M2“乾元重宝”铜钱	62
图一二一 M2“五铢”铜钱	62
图一二二 M2铜泡背面 (M2 : 3)	62
图一二三 M2铜泡 (M2 : 3、4、6、7、10~13)	63
图一二四 M2出土部分棺钉	63
图一二五 《故奉义郎歙州婺源县令陈公墓志铭并序》墓志铭	65
图一二六 《故奉义郎歙州婺源县令陈公墓志铭并序》墓志铭拓片	66
图一二七 《唐故歙州婺源县令陈府君夫人墓志铭并序》墓志铭	67
图一二八 《唐故歙州婺源县令陈府君夫人墓志铭并序》墓志铭拓片	68

第一章 绪 言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一 地理环境

厦门市位于福建省南部，由厦门岛、鼓浪屿和与厦门岛隔海相望的北岸、西岸大陆组成，陆地面积 1640.2 平方千米，海域面积 300 多平方千米。其中，厦门岛东西长约 11.5、南北长约 13.5 千米，面积约 128 平方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 $24^{\circ}25' \sim 24^{\circ}54'$ ，东经 $117^{\circ}53' \sim 118^{\circ}25'$ 。

根据 2011 年 6 月 10 日公布的《厦门市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止到 2010 年 11 月 1 日，厦门市常住人口 3531347 人，其中，男性人口 1832194 人，占总人口的 51.88%；女性人口 1699153 人，占总人口的 48.12%。城镇人口 3119413 人，占总人口的 88.33%；乡村人口 411934 人，占总人口的 11.67%。具有本省外市户籍的迁入人口 821517 人，占总人口的 23.26%；具有外省户籍的迁入人口 1023769 人，占总人口的 29%；本市户籍人口 1686061 人，占总人口的 47.75%。

厦门市现设思明、湖里、海沧、集美、同安、翔安 6 个区，其中，思明区、湖里区位于厦门岛及鼓浪屿，海沧、集美、同安、翔安 4 个区位于福建沿海大陆，与厦门岛隔海相望。

厦门市东临泉州市，西临漳州市，西、北以低矮丘陵的分水岭与漳州市、泉州市分界，最高峰为云顶山，海拔 1175 米。厦门市境内最高峰为大尖山，海拔 1110 米。主要河流有过芸溪、苎溪、后溪、上陵溪、莲花溪、澳溪、汀溪、西溪、东溪、茂林溪、内田溪等。年平均气温 21.2°C ，年极端最高温度 38.4°C ，年极端最低温度 2°C ，年降水量 1432.2 毫米，无霜期 326 天。厦门区域海水表层年最低温度 10°C ，最高温度 31.5°C ，年平均温度 $20.7 \sim 21.6^{\circ}\text{C}$ 。

厦门市西北背靠大陆，东南面向海洋，地处北回归线偏北约 1° ，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缘，受海洋影响较为显著，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夏季长而无酷暑，秋春相连而无冬，全年几乎均为无霜期，气温变化不显著。风向变化明显而稳定，夏季偏南风而暖湿，冬季偏北风而干冷。

鼓浪屿，位于厦门岛西南，隔海（当地称为“鹭江”）与厦门市区相望。地理坐标为北纬

24°26′20″~24°27′26″，东经118°03′07″~118°04′21″，面积1.89平方千米。鼓浪屿由距今1.08亿年的燕山晚期中粒花岗岩组成，是一座大陆岛，属于猴屿—大屿—鼓浪屿岛群，与厦门岛东南部为同一岩体。燕尾山、笔架山、鸡母山、龙头山、英雄山、浪洞山、升旗山形成岛上的主脉。岛上的7个山头及海岸带均有巨型球状花岗岩分布，如日光岩、鸡母石、面包山、覆鼎岩、关刀石、驼背石（剑石）、印斗石、鹿耳礁等，其中，日光岩（亦称晃岩）为全岛最高点，海拔92.68米。

二 历史沿革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证实，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厦门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厦门岛也发现有商周时期的多件石器。晋太康三年（282年），中央政府开始设治管辖，唐代中叶以后，厦门岛开始较大规模的开发。民国以后，由于历史和地缘上的关系，厦门岛与鼓浪屿等数个岛屿曾经演变成为独立的行政单位，民国期间，析大金门岛、小金门岛、大嶝岛和小嶝岛设金门县。而今，厦门市在大陆沿海的行政区域多为过去的同安县所辖，1912年以前，厦门一直隶属于同安县。

同安县，晋太康三年（282年）置，属晋安郡，后并入南安县。唐贞元十九年（803年）析南安县西南四乡设大同场。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升格为同安县，隶属泉州。宋属清源军、平海军、泉州，元属泉州路，明属泉州府。

厦门岛，据泉州出土的《唐许氏故许氏陈夫人墓志》记载，唐至德至贞元年间（756~805年）称“新城”；据厦门此次出土的唐《故奉义郎前歙州婺源县令陈公墓志铭并序》记载，唐大中年间（847~860年）称“嘉禾里”。宋称“嘉禾里”、“嘉禾屿”，属泉州府同安县管辖。宋嘉祐三年（1058年），开始在岛上驻军设防。元至元年间（1264~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厦门岛设立军政合一的“嘉禾千户所”。元末明初，倭寇、海盗屡犯沿海地区，为加强海防，明政府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设永宁卫中左守御千户所，筑城于厦门岛西南部，下辖东澳、五通两寨。自此，中左所、厦门开始载入典籍。清顺治四年（1647年），郑成功驻军鼓浪屿，七年（1650年），又据厦门岛，十二年（1655年），置思明州。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署移驻厦门，同年以台湾府合厦门置台厦兵备道于厦门，二十五年（1686年），以泉州府同知分防，设厦门厅。清雍正五年（1727年），台厦道撤废，兴泉道自泉州移驻厦门建署，辖兴化、泉州两府，十二年（1734年），加辖永春州，称兴泉永道。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加授海防兵备衔，称“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

关于厦门的地名从出现到形成再到确定，其顺序是先有“中左所”，后有“厦门”，然后才有“鼓浪屿”。今天的厦门岛因明代设立“中左守御千户所”而得名，“中左所”即代表厦门岛，从文献和历史地图可以看到这个变化的过程，明正德七八年间（1512~1513年）的《扬子器跋輿地图》首先出现“中左”的标注。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福建海防图》中，则标注“中左所即厦门”。在此前后的地图中间或出现“中左”、“中左所”或“厦门”的标注。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沿海图》中，将中左所与厦门分别标注，对比地图标注的相对位置，并参照实地调查和文献记载考证，当时的厦门位于“中左所城”南门和东门外，即今镇海路以西至中山路、大同路一带。这一地名的变化是因为“中左所城”军事地位逐渐降低，作为城防的功能和作用减弱，而随着城内

及周边地区居民、工商业、寺庙、书院等日益增多,民居、文化和工商业等城市功能的提高,“中左”、“中左所”的称谓逐渐被“厦门”所取代,并作为整个岛的名称固定下来。

鼓浪屿,宋元时称“圆沙洲”,明代始称鼓浪屿。清顺治四年(1647年),郑成功驻军鼓浪屿训练水师。清初,设鼓浪屿澳,为厦门五大澳之一。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厦门设立闽海关“通洋正口”,鼓浪屿为其下的三个青单小口之一。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签定了中英《南京条约》,翌年11月,辟厦门为通商口岸。1862年3月,西方列强在鼓浪屿设立海关税务司。1902年1月,清政府签定《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和《续订公地条约》,并于翌年成立由各国领事团控制的工部局,鼓浪屿成为“公共地界”,实际上是列强国家不交租金的“公共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鼓浪屿,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17日,鼓浪屿回归祖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设鼓浪屿区。2003年撤销建制,划归思明区。民国元年(1912年),曾析同安县嘉禾里(厦门)和大金门、小金门、大嶝、小嶝4个岛屿置思明县,同年升思明府,旋废。1915年,析大金门、小金门、大嶝、小嶝4个岛屿设金门县,同年置南路道。1935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设立厦门市,4月1日,厦门市政府成立。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翌年5月13日厦门沦陷。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0月4日恢复厦门市建制。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10月21日成立厦门市人民政府。1950年10月,厦门市设开元、思明、鼓浪屿、禾山、厦港(后废)5区。1953年,同安县集美镇划归厦门市辖。1958年,同安县划归厦门市辖。1966年,开元、思明区更名为东风、向阳区,1979年恢复原名。1970年,同安县划归晋江专区,1973年复归厦门市,1978年设杏林区,1987年设湖里区,郊区改为集美区,1996年同安撤县设区。2003年撤开元、鼓浪屿、杏林区,增设海沧、翔安区。至此,厦门市辖有思明、湖里、集美、海沧、同安、翔安6个区。厦门市现为副省级城市,5个非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之一。

第二节 工作经历

一 发掘经过

陈元通夫妇墓位于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办事处后坑居委会后院埔小山坡上(原禾东路北侧路旁,现仙岳路与金尚路交叉口东侧、仙岳路东西方向两条车道的中间),地理坐标为北纬 $24^{\circ}30.088'$,东经 $118^{\circ}8.746'$ (图一)。1961年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又予以重新公布,2001年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厦门市涉台文物古迹。2004年12月底至2005年4月中旬,为配合厦门市仙岳路的改造工程,经批准,由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陈元通夫妇墓为双穴双冢龟背形封土墓;坐北朝南,两座墓冢相距约10米,西侧墓冢靠前,东侧墓冢较西侧墓冢错后约2米,两座墓葬之间略偏西处有大榕树一棵。墓区占地面积约120平方米。



图一 陈元通夫妇墓地理位置图

为加强对墓葬的保护，1987年，市文物主管部门修建了东西长22、南北长17米的砖砌围墙，占地面积约374平方米。

东侧一座封土长6、宽4.51、高0.8米，墓碑为花岗岩质，碑首为圆弧形，墓碑高133、宽90、厚20厘米，镌刻行楷书字“唐上柱国陈公茔”、“同治癸酉年（1873年）重修”、“派下裔孙采廷芸允彩宗凯丹诏德圭为山”（图二），墓前有长宽均20、高30厘米的小石柱一对。西侧一座封土长5、宽3.5、高0.7米，墓碑为花岗岩质，倭首，高139、宽90、厚20厘米，镌刻行楷书字“大唐赐进士出身陈公封茔”、“派下裔孙采廷芸允彩宗凯丹诏德圭为山等仝勒石”（图三）。在两座墓葬之间立有一通略小的长方形石碑，高90、宽60、边厚16厘米，镌刻楷书“唐福唐令陈公茔”，据调查，此碑系从墓地西面小东山搬移至此，不属于该墓区内的原物。

仙岳路改造工程方案确定后，原定将墓葬迁往石头皮山，因此，在工程开始前后，厦门市文物主管部门一直在与建设单位和陈氏宗亲及有关部门就墓葬迁址问题进行协调。及至2004年12月中旬，文物主管部门最后决定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墓葬围墙外四周的公路均已建设完毕，墓区成为一座孤岛，省、市文物主管部门将发掘任务交给了于2004年11月刚刚成立的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而且要求在短期内尽快完成，以保证建设工程的进度。受厦门市市政工程建设总公司的委托后，抢救性发掘工作随即开始进行。



图二 “唐上柱国陈公茔”墓碑



图三 “大唐赐进士出身陈公封茔”墓碑

发掘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2004年12月24日开始，为加快发掘进度，元旦期间也未休息，由于发掘过程中受到干扰，为确保文物安全，在绘图和拍照结束后，迫不得已于2005年1月10日当晚将墓葬中的出土文物抢运回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文物库房，发掘工作暂停，发掘共进行了17个工作日。第二阶段自2005年4月9日开始，至4月29日发掘工作基本结束，共21个工作日。而由于墓室的结构相当复杂，绘图工作一直持续到同年6月。

此次抢救性发掘，首先对墓区围墙内进行了考古钻探，确定地下保存有两座墓葬，未发现地下有其他遗迹现象。发掘共清理两座墓葬，按墓葬发掘的左右和时间顺序，将西侧一座墓葬编号为M1，将东侧一座墓葬编号为M2。

发掘工作结束后，对出土文物和资料的整理工作陆续进行，珍贵文物的技术保护和修复分别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进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还对银器的金属成分以及棺钉结构进行了分析。

未发掘之前，根据墓葬地表上清代同治癸酉年（1873年）重修时所立墓碑的内容，以及南院派陈氏族谱记载，该墓葬一直被认定为“陈喜墓”，但是，两座墓葬的碑文分别为“唐上柱国陈公莹”、“大唐赐进士出身陈公封莹”（参见图二、三），又都是同一个人，对此一直无法解释。据族谱记载，陈喜为南院派系陈氏七世祖，曾任开封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是唐代开发厦门的“南陈北薛”两大家族中的陈氏第三代。但是，为什么是两座墓冢，是衣冠冢还是空墓，或者是地下根本就没有墓葬，无论是陈氏后裔宗亲还是地方史研究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过此次发掘，根据墓葬中出土的墓志铭证实，两座墓葬的主人分别为陈元通和夫人汪氏，陈元通为陈喜之孙。在福建省目前发现的唐代墓葬中，这两座墓葬的墓室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出土文物的等级最高，品种、数量最为丰富，墓主的身份、年代明确，是福建省唐代考古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二 工作人员

此次发掘工作由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靳维柏主持，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有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郑东，另外请厦门市博物馆林元平、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吴小平以及考古专业的部分学生参加协助发掘。现场墓室绘图由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部分学生进行，郑东进行了室内清绘。器物图由武夷山市博物馆赵兰玉和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郑东绘制，其中，银鎏金摩羯纹多曲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李振远绘制，墓葬位置示意图由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王蒙绘制，墓志铭拓片由厦门市博物馆苏梦飞制作。

墓中出土的两块墓志铭《故奉义郎歙州婺源令陈公墓志铭并序》和《唐故歙州婺源令陈府君夫人墓志铭并序》，由靳维柏、郑东初读，疑难字句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刘钊教授辨识并对全篇进行了句读。

出土的银质文物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进行了检测分析和技术保护，对铜棺钉的制作工艺进行了分析。